

京官名宦与惠州 6

统筹策划/陈晓鹏

插图 杜卉

清

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历经10位皇帝、共268年，全国有书院4365所，是唐至元明各朝书院总和的1.49倍。其时，广东有531所书院，第一次以多出139所的优势超越江西，居全国首位，是全国书院最为发达的省份。清朝雍正、乾隆年间，随着客家人的不断迁入，原本惠州地区的荒野田地逐步被开垦，在这一过程中，惠州乡村书院大量涌现，东江科举人才和客家文化兴起，为满清入关以来，惠州沉寂多年的文化教育增添了一道亮色。



文脉故事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实习生 李锦奇

700年丰湖书院在清朝达到鼎盛

丰湖书院位于惠州西湖丰湖岛内，“三面皆水，蟠踞一山”。岛上风光幽雅，古树参天，书院建筑古朴典雅，园内小景、亭台楼阁一应俱全，环境清幽，偶有鸟语蝉鸣，游客在其中悠然自得。丰湖书院始创于南宋，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宋淳祐四年(1244年)，在今桥西银冈岭就创建有讲学的“聚贤堂”，十年后被改为“丰湖书院”，后废于明洪武年间。入清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惠州知府王瑛在黄塘重建丰湖书院，但不久又被废。直至一百多年后，嘉庆年间伊秉绶任惠州知府，应惠州十属士绅之请，大规模修建丰湖书院，聘名士宋湘为第一任院长。伊秉绶进士及第，廉史善政，宋湘则为岭南才子，能诗善书，两人联手再度让丰湖书院焕发出生机。现惠州学院校内残存的丰湖书院遗迹都是伊秉绶时代的，现存的楹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是为宋湘所题。清代重建后的丰湖书院所聘院长均为当时名士，大部分出身进士。自重建后至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近百年时间，“从者云集，人竞向学”，是丰湖书院的鼎盛时期，期间培养了大量人才。时人将丰湖书院与广州海学堂、肇庆星岩书院、顺德容山书院并称为广东四大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年)，梁鼎芬任丰湖书院院长时，创建了丰湖书院“书藏”，开惠州书院、学校藏书先河。他不仅自捐大量书籍，还动员士绅名宦捐书，共募集图书典籍5.6万册，并“亲手题签，自装部目”，编《丰湖藏书目》八卷。在院西侧“筑楼三楹，作藏书之用”，名为“书藏”。此举有力地推动了书院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上的读书风气，时江逢辰有诗云：“丰湖先生作书藏，小户贫家知买书；但得五年搜旧籍，不辞三月食无鱼。”然而民国时期战火纷飞，书藏图书大部分移置城内，1931年，另行建立丰湖图书馆，即今惠州市图书馆前身。1946年春，今惠州学院前身省立粤秀中学从连县迁驻丰湖书院，不久改名为广东省立惠州师范学校，复建丰湖书院各建筑物。丰湖书院历经近千年的历史变迁，到今天经过重新规划建设已焕然一新，现丰湖书院基本按历史恢复了仿古建筑群，成为丰湖书院景点。恢复重建有丰湖书院门楼、尚志轩、乐群堂、藏书楼、文昌阁和蓬庐、澄观楼、夕照亭、浴风阁等历史建筑和其他人文景观。另外，还增建了博学笃志、格物明德、丰湖书院等牌楼。沿中轴线建有小桥、山门、殿堂、书楼、东西两庑，院外还建有亭、台、楼、阁、榭、奇石飞瀑等小景，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交相辉映，正成为一处集文化、园林、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人文生态景观。宋湘所撰门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正是对这一人文自然景观的高度概括。

文脉调查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实习生 李锦奇

昔日百年传承黄氏书室 今日成东江民俗文物馆

黄氏书室建于清道光十二年(1842年)，距今已有178年的历史，为阔三间、深三进的典型明清祠堂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是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西湖畔环城西路36号，身处闹市更衬托出书室幽雅一隅的幽静。记者在实地走访时看到，黄氏书室为三进式院落，左侧另有三进配房以小巷侧门连接，建筑总面积1000平方米。一进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大门两侧次间与明间前面各安放一条弓形石枋，枋下两边使用石质角榀，枋上安放石狮，狮上置一斗三升斗拱。花岗石大门高峻雄伟，高3.6米，阔2.05米。大门匾额“黄氏书室”四字，为楷书、阴刻，每字50x60厘米；楹联“续着循良第一，家传孝友无双”，行书、阴刻，每字25x40厘米，字体俊逸流畅，有较高的书法价值。入门两侧有须门墩石一对，通高63厘米、通阔54厘米。连接一、二两进的回廊共有三部分，中间硬山式屋顶，前后两间为卷棚式屋顶，此种做法既扩大了前天井的深度，又显得富有变化。卷棚廊梁上安放八边瓜棱与梅花斗组成的联合构件托承檩条，此构件雕刻精巧别致，颇具地方特色。廊房横披装饰纹饰丰富多样。整座建筑使用布灰瓦，而用绿色琉璃瓦剪边，显得庄重古朴。建筑内雕刻工艺流畅，所刻石狮神传活现，栩栩如生，木构件雕饰，斗子精巧典雅。墙壁上保存了很多绘有古代圣贤的壁画。记者了解到，黄氏书室原先是归善县(今惠阳县、惠东县、惠城区、宝安区部分地区)黄氏的祖祠，后来改成黄氏书室。据史料不完全统计，归善黄氏历代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归善县中举290人，其中黄姓中举18人，清末1人中恩进士。有的族人官至州同、州判、知县、县丞、教谕、千总。至近现代，依然人才辈出，族人任师长、专员、县长不乏其人；教授、总工程师等高级职称者更是人数众多。惠州著名教育家黄植植、中山大学原校长黄焕秋等就是归善黄氏的杰出代表。现在，黄氏书室改建为东江民俗文物馆，2005年7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是目前惠州市唯一一所专题性民俗文物馆，其建立旨在收藏和展示东江地区历代保存下来的民俗文物和民俗资料，并对其进行研究。据悉，民俗馆通过多年的征集筹备，同时得到广大市民的捐赠，如今馆内共展示文物两万余件，图片百余幅，基本陈列分为古陶瓷、古民居、金木雕、传统居住器具、传统农具、东江出水文物、民间工艺精品等七大类，所属年代从新石器时代跨越汉唐明清，直到民国初年。通过民俗文物实物的展示，使人们得以认识民俗的发生、发展、性质、功用等，体会到淳朴、浓厚的民风民俗，体会到几千年来一脉相承、延绵不绝的东江文化。东江民俗文物馆被定为“惠州市涉外参观接待点”，开馆以来，接待外宾、海外游客上千人，成为惠州市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此外，按照有关规定，民俗馆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军人、残疾人等参观实行免费，并免费提供优质的讲解服务，努力为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个汲取知识、提高素质的平台。



官府办学成常态 表旌门第是书香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清代惠州书院在官学化的同时逐步城市化 大量出现的乡村书院为清代惠州文化教育添注活力

从防范到控制 清统治者掌控书院办学权

满清上层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对于汉族知识精英，一直怀有敏感而又深刻的戒惧心理，处处着意防范他们以文字思想鼓动汉人造反。特别是明朝末年发生的“东林书院事件”，令他们印象深刻，挥之不去，以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认为“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宋明其股监也。”以打压为主，辅以怀柔笼络，是他们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政治策略。

顺治登基后，一方面发出“帝王敷治，教化在先”的诏令，重开科举，兴办学校，培养服务新朝的人才。同时，又施以威压手段，加强对读书人的思想控制和言行约束，声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限制读书人结社集会以及聚徒讲学、出版著作的自由。

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总体上秉承了这一方针。康熙以“博学鸿儒”的招安与“文字狱”的恫吓两手并施，较多地体现了怀柔的一面。雍、乾父子则竞相以各种藉口大兴文字狱，镇压异端，统制思想。这种疯狂残暴的文化专制，一直到嘉庆之后，才逐步有所收敛。

清初诸帝的书院政策可以说是与上述的社会政治大环境相呼应的。大体说来，顺治、康熙二帝对书院采取的是阳奉阴抑的手法，一方面批准复建一些全国有名的书院，并亲自为之题词书额，以示

选址府城县城 清代书院呈现官学化特征

清代书院呈现出与明代书院不同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在书院官学化方面，清嘉庆朝之前，惠州的书院几乎全由地方行政官员主导建设，这种情形，与明代惠州书院多为私人创辟的历史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突显了清代书院官学化的时代特色。

清代惠州的主要官办书院一般都在州县治所或人口密集的墟镇，即府办书院在府城，县办书院在县城，这与宋元明书院多选在城郊山水幽静地方有明显不同。这个“不同”，折射出教育学术中心向社会政治中心靠拢的历史趋向，说明清代书院在官学化的同时，也在逐步地城市化，为地方行政长官对书院的就近掌控和督导提供了地利条件。

此外，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不但亲抓书院的创建，而且还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书院的教学活动，如惠州知府王焮、吴嵩、伊秉绶、程含章等，都有“以政暇课生童学业其间，因以登临啸咏”(见王焮《丰湖书院记》)，“与都人士讲学论文”(见叶适

家族书院发力 客家移民成惠州书院活力

清代惠州书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家族书院为主要形态的各类乡村书院大量出现，使广大农村远离教育、文化落后的传统面貌得到逐步的改变，特别是进入雍、乾时期以后，随着客家人口从福建、江西和粤东山区不断迁入惠州各县，尤其是海禁复辟区和边远山区。据有关资料统计：康熙十一年(1672年)惠州总人口13.9万，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发展到137.4万，146年间增长了近9倍。

客家是一个具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和自我文化认同的汉族民系，历来重视读书和科举功名。他们迁入惠州地区，带来了崇文重教、力耕苦读的

《莫丽湖山记》)，“亲为生童讲解文字”(见程含章《增广丰湖书院膏伙碑记》)的记载，这种情况在明代的惠州书院并不多见，是清代惠州书院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与科举考试制度的关系，清代书院比明代书院结合得更紧密，可以说是完全纳入了科举制度的轨道。义学(亦有称为书院)“选未成而可造之小子肄业于其中”“进已成之士，而教之于庠序”，也就是为更高等级的科举考试输送人才，在官方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几与儒学相埒”。清代书院已不再是自由讲学研究学问的场所，而是各级儒学的附庸和补充。至清末，它甚至取代了儒学教育育才的功能，使儒学退化成为单纯的官方行政管理机构。

在清代，由于官方的强力介入和全面主导，惠州书院自由讲学、涵养学术的特质在逐步消亡。惠州清代学术思想远不及明代活跃和繁荣，基本上没有出现对在岭南较有影响力

人文传统。随着迁入人口日益增多，客家子弟入学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问题日益突显，大量宗族式的客家乡村书院、山房、书屋应运而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乾隆七年由当地叶姓八大房公议兴建的归善镇隆仰岱山房，乾隆中由多祝蔡步瞻首创的归善多祝养中书屋，嘉庆年间由县人廖肇衍创建的紫金桂山围的文明书舍，道光年间由马来西亚华侨叶迈帆捐资创办的归善挺秀书院，光绪年间由古竹各姓乡人集资兴建的紫金凤岗书院，以及晚清名臣邓承修退休后倡办的归善淡水崇雅书院等。这些书院的兴办，为沉寂

多年的清代惠州文化教育添注了一股新活力。同治八年(1869年)朝廷颁谕：“新迁客民准其附入各该州县，另编客籍，一体考试，每童生二十人取进一名，以示鼓励。”惠州府学学额则另增客籍文学两名。至同治十年，此项临时增额又定为永远实额。这些扶持政策颁布落实，对惠州客家地区的乡村教育更是有力的推动。与此相呼应，惠州科举人才的孵化热点开始从中心城市向边远山村转移，东江客家科举人才不断涌现，并表现出家族性和密集性的态势。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兴盛于清嘉庆前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乡村教育的大力发展。